

序

人需要认同，并把构成一个严密整体的价值当作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如果在人们周围的文化中也存在价值的这种严密一贯性，那么这些价值就更容易被人吸收。

欧洲各国的文化在何种程度上还能作为严密一贯的基本价值的基础？由于信息和通讯的进步，历史运动加速了步伐，其结果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历史阶段重叠交叉现象，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可以发现来自不同文化阶段的价值。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代与代之间的压力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引起某种不确定感，甚至一定的混乱。于是，可以同时看到，有些人力图保持同自己的“根”的经常接触，而另一些人则希望使自己得到解放和利用上述现象所提供的一切新的可能。欧洲今天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

与此同时，欧洲在国际范围内的作用却江河直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现象导致了失望和怀疑。在危机时代，认识自身的同一性和清醒地判断应该作出新的选择的需要与日俱增。实际上，文化的一切深层变革表明，新的价值正在诞生，旧的价值趋于消亡。或者至少某些既存价值所具有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更好地认识当代欧洲的价值体系，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更好地认识欧洲的价值正在发生的变革，这一愿望促使西欧的一个研究小组对欧洲的价值问题进行调查。最初，这项调查原定在 4 个西欧国家和若干东欧国家内进行。但东欧国家没有能及时提供合作。另一方面，调查从原定的 4 个西欧国家扩大到了 9 个：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和丹麦。在联合王国中，特别注意调查北爱尔兰的

况。芬兰、瑞典和挪威的一些研究者也用同样的问题各自负责在本国进行调查。其他西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同样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兴趣。除欧洲之外，类似的调查曾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南朝鲜和南非进行过。在其他一些非欧洲国家中，正在准备进行调查。

本书所阐发的关于西欧 9 国的研究是由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完成的，该组织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伦敦“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联邦德国阿伦巴赫的民意测验研究所、巴黎的法国民意测验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事实与舆论”研究中心和马德里的“数据”研究中心等 4 个机构，无论在准备或进行调查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于 1981 年汇总。关于欧洲价值体系研究小组及其调查的更详细情况参见附录。

基金会要热切感谢为广大读者撰写了本书的让·斯托策尔教授（巴黎）。斯托策尔教授不负重托，完成了对数量惊人的资料进行综合，并用尽量能使不熟悉社会学调查的词汇和分析技术的读者读懂的通俗形式加以介绍的艰难任务。

除本书之外，有关西欧 9 国的每个国家的著述正在撰写中。它们将把 9 个国家的总的结果作为背景，分析本国的数据。有些国家的有关研究几乎同本书同时问世。

另一方面，基金会还在准备一部对所有进行过这类调查的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加以比较的研究著作。最后，基金会希望能定期进行这样的调查，至少在西欧范围内，以便更加准确地确定价值的转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它打算建立一个研究所。

阐述上述问题的各种研究著作一旦发表，其他研究者就能分享其成果。实际上，借助业已占有的数据，可以进行许多局部的研究。

基金会要特别感谢“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戈登·希尔德博士和梅里尔·詹姆斯小姐，他们在处理大量的数据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竭诚促进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调查。

基金会热诚感谢为赞助这次调查提供了财政手段的一切机构——各种基金会、企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机构。我们之所以不在这里——提到它们的名字，是因为有些机构不希望这样做。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欧洲文化基金会给予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不揣冒昧地希望，这次调查的结果能够对欧洲肩负某种责任的一切人——教育家、政治家、企业领导人、工会负责人、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对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的一切人有所裨益。没有“回忆”就无所谓前景。没有展望未来的前景，就没有解决的可能。本书也许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西欧的文化。

R·A·德摩尔博士、教授

J·凯尔克霍夫斯博士、教授

前 言

本书是《序》的作者谦逊地谈到的那个研究小组所作的调查成果之一。在决定进行这项调查之初，可谓雄心勃勃。正如两位教授本人所言，其目的是要更好地认识当代欧洲的价值体系，而且如果可能，进而认识正在发生的价值的变革。

也许人们并不知道，类似的调查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实际上，自 1953 年以来，日本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这个题目下，以每 5 年为一个周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其意图显而易见是为了观察日本公众舆论和态度的变革。

但是，无论就实际内容或者精神而言，在日本的民意测验和欧洲所进行的这项调查之间存在三点根本差别。日本的调查是近 30 年来有规律地定期进行的，从而可以看出这个以旭日为标志的国家中的价值选择的变革，不仅揭示变革的总体图像，而且通过同届人口统计方法准确地展现变革的机制。值得庆贺的是，会址设在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基金会正在寻求遵循上述榜样的途径。

但是，日本小组的成员^①断然把自己的调查限制在本国范围之内，虽然日本政府极其重视国际的比较，而且这些研究人员本身也曾致力于发展他们同西方同行的密切关系。相反，欧洲的调查始终被认为是多国性的。本书将要阐述的内容关系到西欧 9 个国家，而且，类似的研究正在扩大至全球的广泛地区，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受到他们的价值激励。价值表达了他们的需要和愿望，说明他们的相互关系，而对这些价值的比较确切的

其成员有林知已夫、青山博次郎、西平重喜、坂本吉之和铃木达三。西平重喜曾在索波纳大学（巴黎大学）担任过一年副教授。

认识也许可以使我们预见到它们的变革。

第三个差别在于，从开始阶段起，欧洲的研究者就注意研究我们的价值是否构成某些体系，这是日本人所忽略的。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文化差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的心理时，首先指出了这一点。

对于西欧来说，上述假设被看作是富有活力和正确的。行为、态度和动机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复杂的网络，正如人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实际上，本书并不限于直线地展示或者罗列欧洲人在各个价值领域里的取向。政治、宗教、道德、职业和家庭的选择构成某些相互联系而又有一定的个性特征的复杂交叉网。

这些联系首先是个人自身的活动，即使他们在这样做时并非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必需服从个性协调一致的文化要求。以回答调查的问题的例子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到当人们围绕政治立场的轴从左向右滑动，并且强调上帝的重要意义时，道德的宽容性就减少；实际上，政治态度和宗教态度两者是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诚然，也不乏例外，调查的结果为分析者提供了某些悖于常情的例子，有人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同时却在宗教观点上保持十分超然的态度，也有些极左分子笃信上帝。因此，对特基本选择的态度看来正在受到各种对抗力量的影响，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存在着某种心理物理学。如果我们能够忘记作为行动主角的实际上是个人，那么心理物理学这个术语也许是可以接受的。最好还是用人的逻辑的提法。博伊斯早就说过：人是天生的理性单个实体。不管我们的各种分泌腺把我们推向什么态度，我们认为，我们西方人作为个人的总和将服从理性，我们的自由并非是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

如果我们不再用个人的观点来思考群众性的答案，那么图像就发生了变化。无论在什么时候，答案都是以量的形式出现的，

通过不同指数获得的频率的分布状况是在偶然性作用下得出的。其原因是，每个人作为上述特定条件下的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都选择符合个人规定性的答案，而个人的规定性在数量上是无限的，肯定很多，对此我们只有某种模糊的想法。

年龄是这些规定性之一。它是人的一个本质的而又瞬时即变的特征。年龄每日每时都在变化；它表明我们都会有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但前者不断加长，后者不断缩短；它使我们在生命过程中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沉积着我们经验的每个立足点都向着我们的期望开放，或者关闭了通向期望之门；我们通过回忆和预见同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同我们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联结了起来。

这也许使笔者可以提到，我们的首要发现之一（它使笔者十分吃惊，我们想也会使读者吃惊）是认为年龄按照某种三段式的律规同一系列有关价值的变量联结在一起。这个论断首先运用来根据年龄确定个人的健康状况，并可以扩大到其他许多问题上。它要求我们注意以个人为主体而属于社会心理领域的各种机制的作用。

研究其他规定性——性别、工作和职业、教育水平、居住条件和居住地点、收入和财产、民族性是为了确定它们同价值选择的关系，每一个规定性都带来各自部分的信息，有时很丰富，但通常较少。对于民族性的研究只能是粗线条的，但它使我们得出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平庸，而对于涉足国际比较的研究者来说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在各个价值领域里，现实表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范，正如它们各自有着或是夸张或是适度、或是过分或是克制和平静的言语（不是语言，而是言语）。因此，就价值而言，应该搞清楚比较的是什么？是生活方式还是有关的评价？在本书中将可以看到某些例证，每个人可以根据各自的意图作出判断。

此外，还有一个尚未谈到的原因说明年龄的规定性无疑是最重要的。日本学者坂本吉之在概括1973年的日本调查结果时指

出：“所谓代沟问题首先是由老年人提出来的。而且，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源看来在于老年人对青年一代的新观点以及不关心老年人的态度强烈感到某种反感和悲哀。他们坚信，青年人应该赞同老一辈的看法”。^①由此可见，因年龄而产生的态度差别不仅仅是一个事实状态和理性认识的对象。它包含着情感甚至冲动的内容。

这说明为什么许多人都关注这些差别，对这些差别的介绍散见于本书不同章节，然后在第九章中加以集中论述。人们根据不同迹象，怀着希望或者焦虑探索着我们文明的价值的前景。这篇前言的意图并非是要给理所当然的好奇心的烈火泼冷水。适时作出提醒是必要的。一旦翻过这一页，读者将面对当代的各种事实，他们的思想将开始自由驰骋。

^① 《日本国民性研究》，第3卷，东京，1975年，附录，第35—36页

当代价值——欧洲处在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这是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曾经历过的境遇。应该走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路？十字路口，这是选择的关口。没有十字路口，也就无所谓选择。

本书对象是一次调查的结果。^①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西欧的居民曾300多次被置身于十字路口。他们之所以300多次遇到选择关口，是因为道路呈树枝形分岔，而不象江河的支流。

但是，我们心头仍然犹豫不定。到底是哪种比喻最为确切？是向四面八方伸出枝叉的乔木还是把支流和溪水汇入自身的江河？

对于走路的人来说，乔木形岔路口的比喻无疑是合乎日常生活经验的。但是，实际上难道我们在进行选择时不受我们天性的倾向和体质的倾向引导？一个人的天性和体质也许就是我们的性别、年龄或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所谓社会则是我们的社会，绝不是他人的社会，也就是说，是在这一历史时刻的我们国家的社会。

这些就是本书在1981年进行的欧洲广泛调查的结果基础上将要提出的若干问题。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最终地解决。

见附录中的调查情况介绍。

第一章 道德

作为本书开始，应该首先用最普通的语言探讨今天欧洲人面临已经出现以及特别是此刻正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岔路，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因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被纳入了道德、政治、宗教、家庭、工作以及同自身、同世界和同他人关系的轨道。在所有这一切领域里，在所有这一切阵地上，欧洲人必须进行选择，在各种价值中间作出自己的抉择。

由于道德是指导行为的法则总和，因此从道德着手检验欧洲人的价值选择是适当的。

一、公众对欧洲一般道德观的看法

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时代使我们面对价值的变革特别是道德观的普遍衰落。这种看法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地方，并且都倾向于认为自己不仅身居世界的中心，而且处于特别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正因为这样，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在回答调查的问题时认为，互助已不再是10年以前的样子。他们不认为自己能信任他人。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人本质上是善良的。一半以上的劳动者具有受到剥削的感觉。人们普遍希望更多地尊重权威，以及特别是进一步注重家庭生活。

对于奉行基督教“十诫”的看法提供了也许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有启发性的征象，说明欧洲公众对一般道德观的想法。根据收到的答卷，完全信守摩西戒律者的比例平均不到公众的四分之一。诚然，当问及他们对自身奉行十诫的评估时，调查对象的估

计高出四分之一这个平均数，如果就对于通奸和用垂涎的目光盯着邻居的妻子这种行为看法而言，那么认为应该奉行戒律者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

对他人情感的这种藐视态度将在本书的另一章中再加以论述。这里必须立即指出的是，在这个各代人相互交错重叠的世界里，青年不相信老年人信任他们，而老年人更不能设想自己会得到青年信任。不过，调查表明，青年所说的对老年人的信任一般几乎恰恰处在完全不信任和完全信任的等距点上；而当问到老年人，他们对青年的信任是指什么而言时，上述情况同样很明显。这种对他人缺乏了解的状况确实很危险，是许多压力产生的罪魁

二、欧洲人的道德和道德观

这说明为什么对公众舆论关于欧洲价值衰落的看法只能以有待检验的眼光来加以接受和分析。

或许应该说，在同调查对象本身有关的某些答案中清楚地说明，变革实际上已经产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声明赞同他们父辈的政治观点，而今天以左派自居的人更属极少数。四分之一的人赞同他们父辈对待性关系的态度，而越是主张这方面自由的人，同老一辈的态度就越相径庭。就这一点而言，社会态度、宗教态度以及特别是道德态度是具有较强抵抗力的，但调查对象越是年轻，教育水平越高，这方面的抗拒性就越小。我们将会看到，年轻和教育水平高两者通常是合二为一的。

因此，价值的变革是可以在调查中确认的事实，虽然这是一

① 这也许会使统计学家感到好笑，因为抽样调查是注重代表性的，两种估量应该相等。同样，这将促使心理学家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道德问题而言，可以看到某些自我满足和自我辩解的过程。应该指出，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中间，这样的过程表现得最微弱。

种间接的验证方式。

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认为，除了家庭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们作出完全的牺牲。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40%的人不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去打仗，另外有17%的人不知道将做些什么。诚然，这个答案是包括妇女和男子、青年和老人的总的回答。在成年男子中间，准备为祖国战斗的人数比例达到50%。即使如此，也算不上什么巨大的爱国热情。

然而，不应该把景象夸大至漆黑一团。以作为自己国家的公民自豪，这是四分之三欧洲人的行为。这个比例在爱尔兰共和国超过了十分之九，而在联邦德国和荷兰不低于十分之六。

不管大家怎样想，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欧洲人坚持认为，婚姻今天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制度。而在非婚配偶中间，则有约三分之二的人不愿意谈论婚姻问题。

如果说在十分之八的情况下，人们承认每个人既有善又有恶，也就是说承认人无完人，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人人都指望减少罪恶和犯罪，并认为刑事制裁的教育职能应先于惩罚的职能。

这也是原则上不相信任何东西的多数人的看法（虽然他们认为刑罚的职能是惩处的情况比信任他人者多一半）。

因此，尽管人们惊呼欧洲道德普遍衰落（并非都是无稽之谈），我们还是应该冷静思考一下欧洲调查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全部数据。首先，苏格拉底和后来的塞内加倡导的意识反省没有变成僵死的一纸空文。10个欧洲人当中有6个人承认，他们经常或者至少时而体验到对自己行动的后悔感。

顺便要指出的是，年龄越大，这种后悔感就越少，仿佛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同自身越来越一致。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的意识变得更富有弹性，而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越来越相信

完全的性自由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欧洲人赞同，如果在单身者和非婚同居者中间，赞成完全性自由的比例接近40%，其原因看来在于他们多数是青年人，而随着年龄增大，持这种赞同态

度的人一般说来渐趋减少。

因此，上述赞成性自由者比例下降状况使人想到的主要是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不是代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即使在较年轻的人中间，大部分——约十分之六的人仍然表示不赞成性自由，或者说“看情况而定”。

至于在许多欧洲国家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堕胎，^① 调查提出只有在下列4个条件下才能予以赞同：母亲的健康受到威胁，婴儿有先天性缺陷的危险；母亲是独身者，已婚父母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

前两个条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即使在老年人和宗教徒中间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治疗性流产，即使就医生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直至最近时期新医师们仍然原封不动地宣誓恪守）而言，也属允许的例外。

如果我们信息比较灵通，那么就可以知道，许多医学院已经取消了以往毕业生在取得医生文凭时庄严地保证恪守的不作任何流产手术的条款。但对于其他两个堕胎条件，欧洲公众表示不能苟同。母亲独身的论点尤其遭到反对。这个条件只在四分之一的居民中间受到赞同。在无神论者中间，赞同的人刚超过半数，而在比较宽容的其他人中间，没有达到半数，认为这毋宁说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另一个条件是已婚父母本人的意愿。这个论点遭到包括一切年龄的男人和妇女总数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否决。几乎只有少数人——同居者、离婚者、左翼分子、宽容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表示同意。由此可见，立法者无视大多数人的意志。就目前而言，还改变不了早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已经提出的传统道德观。

在性自由和堕胎这两个事例上，对于公众意识来说，存在的

① 英国（但不包括北爱尔兰）在1967年，丹麦在1973年，法国在1975—1979年，联邦德国在1976年，意大利在1978年，荷兰在1978年制定了有关法律。

问题都相当明确。只有若干异端派破坏一致意见。我们将看到，这样的事例并非独一无二。但情况是否都是如此？是非善恶是否都一清二楚呢？

调查中的一个问题是要求在下列两个命题中进行选择：

“善恶之路泾渭分明。它们始终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不论环境如何”。

“善恶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环境”。

两个命题都没有退让余地。可以看到，7%的人拒绝进行选择，另有7%的人未能回答。60%的人选择第二个命题。在分析所划分出的169类人中，只有两类人敢于较多地选择第一个命题，而不选择第二个命题。他们是总数为12,000多例调查对象中间每周参加宗教弥撒的235名新教徒和178名不从国教派。而在他们中间，作出这种选择的比例也分别只占48%和43%。

也许有人认为，对“善恶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这个命题的多数选择表现在处事谨慎，高度成熟，习惯于通过思考来权衡自己一切行为的人中间，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表现在具有严格的道德生活的人中间。在某些事例中，情况可能如此。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十分之七或八选择第二个命题的那几类人的情况，那么结果对上述假设似乎不太有利：他们是政治上加入左翼的人，上学到21岁或更大岁数的人，享有高收入者，非婚同居者，不认为热爱和孝敬父母是无条件义务的人，主张完全性自由者，青年，不信仰上帝者，认为能够宽恕恐怖主义的人，宽容主义者，以及大学生。

事实上，恰恰是在这几类人中间，才能确定应该怎样看待正在逐步取代传统教条的某种新道德的出现。

三、道德的革新：几种美德

如果分析一下哪些是欧洲人首先希望看到使子女接受的美

德，那么情况就更加清楚。

调查提出了一张包括 17 种“品德”的表格，要求每个调查对象从中选择至多 5 种被认为特别重要的美德。结果表明，在这些品德中，没有一种遭到完全否弃，因为其中没有消极的品德，无论是对于所谓传统主义者抑或进步分子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欧洲社会中的多种选择层次和鱼龙混杂的各种倾向使人不无兴趣。在所有国家中，① 选择最多的美德是正直。它入选的人数比例通常接近四分之三，而且往往超过这个比例。这个事实之所以特别值得指出，是因为被选为第二位重要的美德——懂得宽容和尊重他人，平均人数比例只有二分之一。由此可见，正直的美德在欧洲人眼里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

正直既是道德的美德又是社会的美德。就个人侧面而言，它是同荣誉和自尊联系在一起的；它反对放任自由和不诚实的欲念，要求严格检点行为。另一方面，它也是以遵守诺言——通常意味着遵守法规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运转的保障。康德曾经把它当作绝对命令的模式：作为正直的人而进行活动这一准则确实可以被当作普遍的法则。在衡量某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时，正直美德是否占主导地位乃是一个根本性的判断。

另外 5 种品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公众认为是重要的。按入选的人数比例多寡的次序，它们是宽容和尊重他人，举止文雅，责任感，礼貌，忠诚。除此之外，或许还可以加上自我克制，它被 29% 的欧洲人选为应该用以教育子女的特别重要的品德。

不言而喻 对这前 7 种美德的选择因青年或老人的年龄不同，因上学时间长或过早辍学而受教育水平不同，以及道德观、宗教观和政治观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应该指出，分歧是微不足道的，一致是最主要的。可以说，这些美德是对欧洲的孩子进行共同

西班牙除外，其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些问题。

的道德教育的基础。

要求调查对象进行选择的其他 10 种品德都只有平均不足十分之三的选票。但有几类人认为它们很重要，这种选择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例如，节约的品德在 17 种品德中居第 13 位。总计有十分之二的人提到了它 (21%)。但在认为必须使社会免受破坏的人中间，选择比例上升到 28%，而在 65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间达到 32%。它也是包括不同气质和观点的各种人在内的 32% 的法国公众和 36% 的比利时公众的选择。选择节约精神作为优先于其他许多品质的美德来教育子女，这无疑对于了解一些国家的国民态度和思想方式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个例子特别令人感到兴趣，却并非是最典型的。它只居选择分歧状况中的第三位。这种选择分歧可以在态度或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对立的 8 类人中间观察到。^①

不言而喻，不管这些对立公众中的哪一类——相信还是不信上帝、政治上站在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人选择正直、宽容等品德。只是选择的比例不同。

如果考察一下这些分歧及其趋势的总的状况，那么可以对不同品德作一个明确的分类。它们有些属于传统美德，另一些则可以称之为革新的美德。

下面是我们制作的一张分类表（附选择的全部频率）：

就整体而言，可以认为 52% 的欧洲人选择传统美德，48% 选择革新的美德。

从选择品德的倾向来说，传统在欧洲占上风，而这是完全正确的。

① 分别指政治、宗教、道德、对性的看法、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和财产的不同特征。

频率%	传 统	革 新
73	正 直	
51		宽容，尊重他人
49	举止文雅	
46		责任感
34	礼 貌	
32		忠 诚
29		克制自己
27		独立性
25	服 从	
23	专心工作	
21	节约精神	
18		恒 心
17	宗教信仰	
15		利他主义
14	忍 耐	
13		想像力
10		发号施令感

四、道德的严格性与宽容性

对品德的思考和各种美德本身是古希腊道德哲学的核心部分。它是同对至善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品德是手段，目的是个人的幸福。苏格拉底曾拒绝从死牢中越狱，这说明义务观一旦出现，公民的约束力、服从城邦的法律成为公民义务的最终基础。希腊人没有无条件的道德法则。

欧洲人具有这样的道德法则，以规定善与恶，而民法只不过是这种道德法则的反映。但是，这种道德法则尽管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却都按自己的方式，用比较严格的或不太严格的尺度

加以解释，使之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宽容性（这也是立法者的工作）。现在是对欧洲道德的严格性作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为了检验这种道德的严格性，在调查过程中提出了 22 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许多道德上存疑的行为。对于每一种存疑的行为来说，问题在于进行可能的辩护的程度：是否始终是可以辩护的？抑或丝毫不能辩护？还是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部分是可以辩护的？类似温度计刻度的标尺上的每个指数所代表的判断显示出对具有这种特殊行为者的宽容或严格度。

总的说来，对正当自卫状态下的杀人表现出最宽容的判断。还应该指出，与这一判断相应的指数平均值处于接近标尺中间的宽严参半的标志界限内。因此，欧洲公众认为，即使是调查所开列的单子中的最可宽恕的行为，也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得到辩护。不能说公众表现得过分宽容。此外，就调查所列举的 22 种行为的总的状况来说，它们所具有的各种指数的总平均值恰恰处在标尺所显示的受到最严厉谴责的那四分之一部分界限以下。

如果考察一下整个判断图，就可以看到，应该在它的基础上把 22 种行为分为 3 组。

第 1 组包括上面所说的正当自卫状态下的杀人，以及离婚、堕胎和安乐死。在这些行为中，有的已经得到或者正试图得到法律承认。即使如此，它们仍然引起争议，成为意见不一致的讨论对象，天平的重心或多或少倒向要求严格对待的一方。但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庞大的集体信息手段在谈到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时，一般都本着赞同的精神来进行宣传，这无疑也说明这些行为为什么比其他行为通常更容易得到辩护。

判断值彼此十分接近的第 2 组行为一半同性关系有关：同性恋、卖淫、通奸和未成年者的性关系。这些行为受到传统道德谴责，但今天的社会认为，只要它们不公开张扬，就能加以容忍。人人知道这些行为实际存在，但都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组中还包括为了私利不交出拾到的金钱和偷税，这些行